



长崎遭轰炸后,留下的佛像废墟

◀ (上接2版)

新军事史把传统军事史与经验、社会文化以及内部互动等相联系

您的博士论文尝试把技术史和军事史结合起来研究冷战。在实践中,您是如何利用技术做研究的?

尼克·萨姆巴拉克: 历史研究和教学都是需要激情的。在博士论文完成后,我仍与其他研究冷战政策的人有联系,而我的研究也吸引学生,这实现了我的理想和愿景。我最初从技术史的角度考察美国史和军事史,后来在普渡大学我更深入技术领域,利用数码相机和电子计算机等技术,创造性地研究历史。可以说,技术令过去不可能研究的问题成为可能。对我来说,提出问题和寻找事物如何运作、发生及其产生原因是最激动人心的事情,而技术史揭开了事物工作和起作用的原理的奥秘。

您主修技术史,辅修国际关系史,把这两个领域与军事史结合起来研究冷战时期的美国军事史。您如何看待新军事史呢?

尼克·萨姆巴拉克: 长久以来,军事史关注杰出将领,军队则听令攻击和征服,这是标准的军事史写法。大概40年前,新军事史的开拓者之一约翰·基根(John Keegan)不仅关注传统的军事行动、技术术语和左派言论等内容,还关注国家交战双方的相关内容,无论好坏。隐藏的经验如何影响战争?战争对士兵个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此外,战争中的社会和文化,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。

对我来说,历史是一种时尚,可以将细节和脉络联系起来。新军事史把传统军事史与经验、社会文化以及内部互动等相联系,以探索军事行动的影响。在研究和教学中我发现,将不同方面融合在一起,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军事史,意义深远。新军事史既关注新概念和新突破,也注重从过去的研究中寻找新故事。新旧结合的研究很有意思。

比如,1941年7—8月,德国纳粹军队在基辅附近俘获了70万苏联士兵,传统军事史叙事关注事件后德国军队的进一步军事行动。新军事史则会关注不同国家面对这一事件后的反应如何,他们的应对政策,集中营中所受虐待和隔离对士兵和军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。新军事史更侧重关注战场的文化视角,认为各个部分和因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。

技术往往伴随着战争而不断升级和发展。19世纪末,武器技术不断升级,在英国与南非之间爆发的祖鲁战争中,人们开始运用枪支;在殖民战争中使用机械枪的同时,殖民者也树立了很多敌人,令许多殖民帝国走向衰落。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帝国,经历战争和技术发展,而他们的对手手中武器从无到有,对帝国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。以枪支为例,英国的枪支在两战之间取得了长足进步,甘地(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)曾支持英帝国参加一战,而在战后印度也逐步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。甘地在20世纪20—30年代影响力达到巅峰,而在二战中,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并不希望印度人对抗希特勒,后来又派出200万士兵对抗日本和德国。从一战支持英国到二战伊始反对印度派兵参战,甘地的出发点始终是自主性。二战后,印度独立。

在二战中,很多国家通过

技术、政策或策略来提高本国的地位。当时的政策相当丑陋,如利用武器轰炸敌国,损毁建筑。但是没有任何国家帮助苏联人民摆脱饥饿。我不会为原子弹轰炸做辩护,但是日本在1945年春将大量兵力投入到本国防御,这是一件非常可怕而矛盾的行动。没有人考虑平民,他们的政策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抵抗美国。从技术层面看,日本已经没有战斗机了,于是他们训练成年男子和女性手执长矛作战。他们在学校中受训,孩子们则在课堂上挨饿,孩子们的父母想借此避免遭受美国人的伤害。二战是一场全面战争,每拖一天就意味着更多人的死亡。美国从道德和情感等多方面考虑后,最终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,加快了战争的结束。

1944年,美国第一次轰炸日本时避开了城市住宅区,主要针对军事目标,肆虐的炸弹并未造成太大人员伤亡。1945年1月,柯蒂斯·李梅(Curtis LeMay)接任轰炸机部队司令后改变了策略,在夜间使用燃烧弹无区别轰炸,利用轰炸机低空飞行投弹,击中目标,非常有效率。有部电影《长崎》(Nagasaki)就是讲述这个故事的,有65座城市遭受了轰炸。到1945年3月轰炸结束,东京大约有10万人丧生,比广岛和长崎伤亡人数都要多,非常残酷。木质结构的房屋被焚毁,东京大约有半数房屋在一夜之间化为废墟。街道上遍地都是尸体,一个晚上因轰炸而死的日本人大约相当于美国整个二战死亡人数的23%。美国本想利用大轰炸逼迫日本投降,然而未能得偿所愿。于是在3—7月,美国继续轰炸了日本的67座城市,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遭到反复轰炸。日本天皇本可以避免日本人继续受伤害,但是日本军方占据主导,他们始终不肯停下战争的步伐,在中

国战场每天屠戮3000人。美国人不知道到底应该如何彻底击败日本,而日本坚持不放弃在太平洋战场所占的大片领土。纳粹已经被苏联和英美军队打败,苏军和美军将着手对付日本,因而日本全然没有取胜的希望。美国在日本登陆,而坚持不投降的日本人把平民动员起来,让他们加入军队,在九州加强了三倍兵力。理查德·弗兰克(Richard B. Frank)的《衰落:日本帝国的终结》(Richard B. Frank, *Downfall: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pire*, Penguin Books, 2001)讲的就是这段历史。今天我们回顾的时候,看到了战争在末期展现出了最丑陋、最残酷的一面,而在战争时期,它却是残忍而真实的。所有在九州武装起来的日本人都同登陆的美国人做殊死搏斗,直至死亡。当时美国国内对是否使用核武器存有分歧。美国科学研究的负责人范内瓦·布什(Vannevar Bush)是主要反对者,但他的理由并非武器本身是否有效,而是在思考美国作为科技尖端,应该如何使用核武器才能最好地为战争服务。

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话题,也是历史的表现形式。重要的是,我们应该了解世界,理解人们如何解释自己所面临的挑战,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通过讲述人类的经历让后人理解前人的过往。

搞明白不同国家寻求救助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研究

这些年许多美国史的学者试图突破冷战叙事和意识形态冲突。您如何看待美国历史学

界的跨国浪潮?

尼克·萨姆巴拉克: 冷战源于美国和苏联在政治体制、经济体系和社会制度等全方位的冲突,从国际主义观点看,这特别复杂。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,第三世界加入到冲突之中,有的还通过技术和艺术等形式参与到斗争之中,造成意味深远的影响。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,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相互影响。

从去殖民化的角度来看,战后第三世界国家试图通过技术发展的手段摆脱强国的控制。与之相似的还有法国。法国人不甘心沦为二流国家亦步亦趋于美国身后,他们尝试从原子弹等先进技术等方面入手,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,从而证明法国是独立自主的。

研究跨国史有助于理解复杂的国际关系。国家之间、一国人民与国家交往方式各不相同。二战后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和分歧,例如英国和美国对二战后的世界有着全然不同的观点,在很多方面他们彼此对立;在探讨救助方面,人民又始终是个体,彼此之间的需求不同,因此要建立一个联盟,构建一种想象,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。我认为搞明白不同国家寻求救助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研究。

又比如,在看了1945年之后的手稿我发现,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世界大战的看法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。冷战延续自二战,这毫无争议,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,我们能看到海量的关于一战的档案,还有一些关于一战的广播节目、舞台剧、电影等文娱图景,如《多么可爱的战争》(Oh, What a Lovely War! 是一部史诗音乐剧,由琼·利特尔伍德[Joan Littlewood]创作,1963年在剧院上演;1969年被理查德·阿滕伯勒[Richard Attenborough]改编为电影)。所有这些都描绘了冲突,在许多战争亲历者讲述中,我们更能了解战争。不同时代的人对战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,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人和20世纪80年代的人对战争的理解就完全不同。上一辈里的有些人既经历了一战,又从二战中幸存下来。一战给欧洲造成了苦难,很多帝国崩溃了,而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,波及范围也越来越广,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。历史学家尝试从不同时代的人那里去理解历史,从时代和进步两个维度看待历史是非常有趣的。

(作者分别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)



尼克·萨姆巴拉克主编的《战争中的创新路径》与著作《另一个空间的竞赛:艾森豪威尔与太空安全的寻求》